



王艺著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ppiness

幸福转型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艺 著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ppiness

幸福转型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转型论 / 王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766 - 8

I. ①幸… II. ①王… III. ①幸福—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90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夏侠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03 千字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近十年，我致力于幸福学的研究，把幸福学推崇为社会科学的“母学”，意指幸福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犹如作为“母法”的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具体来说，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统帅、主导地位，其他社会科学应以幸福学为基础，遵循幸福学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则。

我对于幸福学的推崇及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深得学生的支持和赞同，他们其中好几位受我的影响，也加入幸福学的研究行列，王艺便是其中一位。王艺博士的硕、博都在浙大，都由我指导，从硕士算起，她从事幸福学研究至今已有近七年了。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与研究，加上她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刻苦，因此在我的学生中，她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她撰写的《论“幸福转型”》是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送审专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称赞有加。近日喜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慧眼识珠，列入出版计划，王艺博士请我为该书作序，我自是欣然命笔。

《论“幸福转型”》在今天的形势下出版问世，毫无疑问，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致 2011 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的贺信中郑重指出：“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食品和影响安全、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土地规划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危机，这些危机与城市化进程、就业机会、公共健康及实现千年目标密不可分。”为此，潘基文秘书长呼吁诸有识之士“寻找出创新性的方法，并开展新的行动”。而在幸福学的角度看来，有效化解和消除上述危机的“创新性的方法”与“新的行动”，正是王艺博士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方法和倡导的行动，也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

行幸福转型。

所谓幸福转型，也就是从现在片面强调结果幸福而转变为结果幸福与过程幸福并重；与此同时，从现在一味追求物质幸福转向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并重。不言而喻，实行幸福转型，使幸福的结构合理化，将会大幅度地减少对水、土地等各种能源、资源的需求，大幅度地减少“三废”的排放，从而有利于缓解与消除生态失衡、资源短缺、食品污染以及道德滑坡等一系列危机。

2011年和2012年对于中国可以说是“幸福年”，2011年在全国各地召开的两会中，“幸福感”成为高频词汇。不少地区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不约而同地提出增加居民幸福感，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比如广东省进一步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而浙江、温州两省也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规划。关注民生，用幸福指数来衡量发展水平，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新提法，更是对“唯GDP”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理念转变。有学者据此认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进行幸福转型。

因此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将朝着古希腊哲人所说的“终极目的”，也就是幸福这个方向前进。而发展模式的幸福转型，或者说幸福化，其中就包含着本书中所提出和论述的从结果幸福向过程幸福，从物质幸福向精神幸福转型。由此看来，《论“幸福转型”》对于我们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幸福化、幸福转型能够作出或大或小的贡献。所以说，王艺博士的专著在今日出版正当其时。我一贯看重论著的学术性，但又不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因此对于自己学生的论著能对社会实践，尤其是重大的社会实践有所贡献，倍感欣慰。当然，凡是有重大实践价值的理论，必定同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最后，借此机会给王艺博士以勉励并表示新的期望。西方有学者说：你想要难住一个人，最好是让他回答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周国平先生也说：“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此，我希望王艺博士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理论勇气，把“无限风光在险峰”作为人生的信念，争当学术界的“虎妞”！

陈湘舸

2012年7月5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基本思路	(20)
第四节 创新之处	(22)
第二章 对幸福的理论分析	(25)
第一节 幸福概念	(25)
一 幸福的本质内涵	(26)
二 幸福的本质属性	(34)
三 幸福的本质特征	(40)
第二节 幸福类型	(45)
一 物质幸福、人际幸福与精神幸福	(46)
二 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	(47)
三 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	(50)
四 创造性幸福与消费性幸福	(52)
五 生存型幸福、享受型幸福与发展型幸福	(53)
第三节 影响幸福的身心机制	(53)

一	影响幸福的生理机制	(54)
二	影响幸福的心理机制	(54)
第四节	影响幸福的因素	(57)
一	人格因素	(58)
二	社会人口因素	(59)
三	经济因素	(61)
四	政治因素	(64)
五	文化因素	(64)
第三章	幸福转型的背景及其理论要点	(66)
第一节	幸福转型的背景	(66)
一	金融危机与幸福转型	(67)
二	生态危机与幸福转型	(69)
三	精神危机与幸福转型	(72)
第二节	幸福转型的含义	(75)
第三节	幸福转型的目的	(77)
第四节	幸福转型的基本原则	(80)
第五节	幸福转型的意义	(85)
第四章	从物质幸福到精神幸福——可能性与合理性分析 ...	(88)
第一节	可能性	(88)
一	理论基础	(89)
二	现实条件	(98)
第二节	合理性	(104)
一	精神幸福比之物质幸福的优越性	(104)
二	追求精神幸福的行动比之追求物质幸福的 行动的优越性	(107)
第五章	从结果幸福到过程幸福——可能性与合理性分析 ...	(112)
第一节	可能性	(113)

一 理论基础	(113)
二 现实条件	(122)
第二节 合理性	(129)
一 人类活动的过程本质是幸福的	(129)
二 追求过程幸福比追求结果幸福更有利于 幸福最大化	(136)
第六章 转型之路	(141)
第一节 观念转型	(141)
一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142)
二 确立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148)
第二节 理论准备	(151)
第三节 制度保障	(158)
第四节 教育改革	(164)
第五节 文化建设	(171)
一 发展高品质的文化休闲产业	(172)
二 建设幸福文化	(175)
结语	(177)
参考文献	(181)
致谢	(196)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① 费尔巴哈也曾说过：“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② 千百年来，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孜孜以求、不懈奋斗，写下了人类发展史上一幕幕美好的篇章，尤其是自工业革命兴起以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使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穷和饥饿的梦魇，走进了一个物质丰裕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成就，是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成果。

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物质财富继续而且持续的高速增长，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再显著地提升了。调查显示：在1946—2004年的将近60年间，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大的波动；欧盟八国民众的平均幸福水平也呈现出同样的情形。^③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3页。

③ Veenhoven R.,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2004: A Reply to Easterl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No. 79, 2006, pp. 421 - 436.

日本则更加典型，从1960年到1987年，其人均GNP翻了两番，成为工业化国家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其平均幸福水平却仍然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①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根据盖洛普公司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在1994—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先升后降，与GDP的增长变化并不同步。^②《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中也指出，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要高于农村居民，但他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农村居民高。^③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近几十年来一直是那些心怀民众福祉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来讲，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幸福悖论的确是存在的，少数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虽然坚持认为收入的增加能够提升幸福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效果是缓慢的和不显著的。^④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合理解释并有效解决这一悖论。

笔者在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社会现实，对幸福悖论的成因及解决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描述财富增长而幸福水平停滞不前这一现象的“幸福悖论”实际上是狭义的幸福悖论，它是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幸福而幸福水平却停滞不前的广义幸福悖论的一个表现。^⑤因为财富的增长说到底也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活动成果，只不过人们基于过去“财富增长=幸福增长”的经验结论，对财富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变化尤其敏感而

① Veenhoven R., "Is Happiness a Trai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32, No. 2, 1994, p. 101.

② 郭昕：《盖洛普：中国“幸福指数”过去十年内先升后降》（http://www.dzw-ww.com/caijing/cjzl/200503/t20050310_992011.htm）。

③ 曾慧超、袁岳：《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gz/shgz11/P020041217591669841728.htm>）。

④ 参见 Veenhoven R.,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2004: A Reply to Easterl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No. 79, 2006, pp. 421—436.

⑤ 或者也可以说，是人类当前遭遇幸福水平停滞不前的“幸福困境”的一个表现。因为追求幸福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追求幸福”这个前提不加也罢。

已。而之所以会出现人们追求幸福却没有收获与他们付出的努力相等的幸福成果的情况，简而言之，是因为幸福是一个由多种类型的幸福构成的系统整体，当前人们片面追求某些特定的幸福类型，以至于忽略甚至牺牲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幸福类型，特别是那些蕴含着更高或者更丰富的价值的幸福类型。因此，要使目前困扰各国的幸福悖论问题真正得以解决，必须实施幸福转型，使人们追求和享有的幸福类型从基础层次向更高层次、从蕴含有限价值向蕴含无限价值转变与发展。

幸福转型作为解决幸福悖论的一种可能方案，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它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幸福转型首先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幸福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虽然古今中外的很多思想家都对幸福问题进行过思考研究，但在诸多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难下定论，而且“幸福”是一个无法探究穷尽的宏大课题，它会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延伸出新的内容，因此幸福将永远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重大问题。但近年来，由于受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影响等，理论界疏于幸福研究，仅有一些有关幸福问题的讨论大都局限于伦理学领域，视野有欠开阔，而且也较少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专题研讨。本研究综合借鉴了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力图发展出一种比较系统的“幸福转型”理论，这一努力有助于拓展幸福研究的视阈，丰富幸福研究的内容，同时把幸福研究推向纵深。就“幸福悖论”这一具体问题而言，由于目前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解释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因此对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的幸福转型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能够为填补应对“幸福悖论”的理论空缺作出重大贡献。

研究幸福转型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一方面能够为现代人提供追求幸福的理论指导，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当前应当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幸福，以及在当今世界怎样才能获得

幸福，从而自觉发动真正能够收获幸福的行动，走出当前幸福水平停滞不前的困境，同时缓解由人类“不幸福”的活动引发的种种危机；另一方面，它能够为执政者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使社会各项计划、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真正有利于增进民众福祉。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有关“幸福悖论”（狭义）的研究

（一）幸福悖论的提出

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在论文《享乐相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中，通过将“适应水平”（adaptation level）理论应用于个体和集体幸福研究中，得出了“更好的客观生活条件（收入或者财富）对于个人福利没有影响”的结论，即“幸福悖论”。^①这篇论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在当时却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类幸福？》的论文，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幸福悖论”进行了阐述，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幸福悖论”由此也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在该文中，伊斯特林利用了两组不同类型的数据，一组是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数据，另一组是心理学家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1965年进行的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数据，这两组数据都是基于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通过对这两组数据的分析，伊斯特林得出了三点

^① Brickman P. & Campbell D. T.,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A Symposiu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pp. 287 - 302.

结论：第一，在一国内部，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在每个单一的调查中，那些高收入阶层平均下来都比低收入阶层更加幸福。”^① 第二，在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国与国之间相比，这种正相关性却并不确定。换句话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富国比穷国的幸福水平更高。第三，来自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幸福感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其中，第三点结论描述的即是“幸福悖论”，围绕这一点，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展开相关的幸福研究，有一些人试图验证“幸福悖论”作为一个命题的真伪，而更多人则是希望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幸福悖论”做出合理解释并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

（二） 对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

目前国外学者常用的解释“幸福悖论”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于1954年提出，指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该理论在经济学中对应的是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S. 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理论”。根据该类理论，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还依赖于相对收入水平。因为人们通常会把自己的收入与周围的人，如同事、邻居、朋友等相比较。比较的结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对自我能力、价值及生活现状的评价，进而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他人比较的相对地位比个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更为重要。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平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并没有给个人的主观

^①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a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4, p. 118.

幸福感带来显著提升。

②水车效应 (treadmill effect)。幸福水车 (hedonic treadmill) 是布里克曼 (Brickman) 和坎贝尔 (Campbell) 两位心理学家创造的一个隐喻, 形容一个人不停地运动, 但幸福水平仍停在原地。^① 关于水车效应有两种不同但密切相关的理论。一是情感适应理论, 是社会比较理论的一种变式, 不同的是社会比较是在个人与他人之间进行的横向比较, 而情感适应则是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点上进行的纵向比较。情感适应理论认为, 由于种种内在原因^②, 无论某种刺激带给我们的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感反应, 随着时间推移或经历相同刺激次数的增多, 我们所体验的情感反应总是逐渐弱化。所以, 随着收入的增多, 同等数量的货币所带来的幸福感是不断降低的。二是定值理论 (set-point theory), 根据该理论, 一个人的幸福水平主要取决于性格、基因以及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各种能力, 即存在着一个由种种个性因素决定的特定幸福水平, 导致任何事物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情感适应之后, 曾经得到了提升或者降低的幸福水平将不可避免地回到当初的“定值”。

③忽视变量理论。即认为人们过于关注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 如收入和消费等, 以至于忽视甚至牺牲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 如亲情、友情、健康、自由、平等、权利、自然环境、制度环境、社会关系等。由于经济因素对幸福的作用力是单一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因此对经济因素的过分关注和对非经济因素的忽视必定导致幸福感在一定水平上的徘徊和停滞不前。尤其是当经济增长是以破坏或牺牲非经济因素为代价时, 经济增长的负效

① Brickman P. & Campbell D. T.,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A Symposiu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pp. 287-302.

② 如奚恺元等人 (2008) 认为, 导致情感适应的主要原因: 生理适应, 大脑对外部信息的模块化记忆降低了处理同种外部信息所需要的大脑唤起水平, 对于外部刺激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对于事件结果的合理化解释。

应会在不同程度上抵消正效应。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就具有两面性，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社会学教授、世界幸福数据库创建者路德·维恩霍夫（Ruut Veenhoven）就指出，经济增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究竟是积极作用多还是消极作用多，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当经济增长引起深刻的文化变迁时，其负面效应就有可能消除正面效应。他认为，这可能就是日本和韩国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没有提升国民幸福的原因。^①

④成瘾性理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基于舒适与快乐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1976年，西托夫斯基在他最负盛名的著作《无快乐的经济》（*The Joyless Economy*）中指出，快乐和舒适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激励力量：舒适感是围绕着或接近于最佳的唤起水平，而快乐则伴随着唤起水平向最佳水平的靠拢。当唤起水平持续地维持在最佳水平时，就不再有任何趋向最佳唤起水平的改变，所以持续的舒适会消除快乐。当人们习惯了特定的舒适水平时，以往能轻易获得的快乐感受就消失了，要继续提高快乐水平，就更加困难，必须寻找强度更大、更具有新奇性的刺激。他进而对“物质生活水平的上升和自评幸福调查所显示出来的人们的奇怪行为之间的矛盾”^②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解释：地位满足（强调地位和阶层的重要性，类似社会比较理论）、工作满足（从工作中获得的刺激和自尊的程度，与个人在社会等级、收入等级中的排序有正相关关系）、新奇性（改变产生新奇感并进而产生满足感，因此收入的升高比稳定的高收入更有价值）和成瘾性（熟悉的生活水平会令人成瘾，在成瘾状态下，保持这一水平不会产生更多快乐，下降却会导致痛苦，

① Veenhoven R.,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 - 2004: A Reply to Easterl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No. 79, 2006, pp. 421 - 436.

② [美]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高永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而上升虽然会带来暂时性满足，但很快又会在新的水平上形成成瘾性)。

⑤关系物品理论。意大利经济学家马里奥·普格诺 (Maurizio Pugno) 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感取决于社会中的关系物品 (Relational goods)。其中，关系物品指基于本地关系的专用性公共资产。信任、友谊、良好的市民关系有助于提升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而为了财富去损害与他人的关系，则会降低关系物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收入提高而幸福降低。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对获得幸福至关重要的关系物品的减少，人们不得不转而追求商品 (market good) 作为补偿，这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加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①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之所以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幸福的增长，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足够好，以至于没有多大的空间来提升我们的主观幸福感了。^②

国内学者对幸福悖论的关注相对较晚，因而对幸福悖论成因的解释大多是基于国外学者的已有理论，只是有从不同角度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化。比如，浙江财经学院的陈惠雄教授从人本经济学的角度对“忽视变量理论”进行了深化，认为幸福悖论现象可以运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包含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不通约性”原理来解释。他在著作《人本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不同层次的需要实际上是不同质的需要，即当人们在基本生理需要没有得到基本满足时，用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去替代基本需要的满足常常低效或无效（比如以发奖状来对付饥饿问题）。同样，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关注和需要的更多

① Pugno M.,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Paradox: a Suggested Solution Based on Relational Goods",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Glensanda House, 2007, pp. 263 - 287.

② Fahey T., "How Do We Feel? Economic Boom and Happiness", *Quality of life in Ireland*, New York Springer, 2007, pp. 11 - 26.

是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如果仍然用满足生理需要的手段去满足这些高层次需要，自然也是低效或无效的。因此，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由于用以保障生理需要满足的手段——收入难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所以收入就不再是幸福的强相关性影响因子，这就是收入与幸福的正向关系在经济增长至一定阶段之后逐渐瓦解的基本原因。^①

现有的最具创新性的解释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博士杨立岩提出的“临界收入理论”。他们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一文中，利用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概念，并结合心理学的社会比较理论，在同时考虑收入与非收入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证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收入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值，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幸福水平或无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② 该理论对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描述目前已被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同。

浙江大学的陈湘舸教授和张修红博士结合“临界收入理论”与“忽视变量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达到临界收入之后，收入的功能从目的向手段转换。他们在论文《论幸福悖论的成因与启示》中指出，收入本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但在经济增长能够极大提升幸福水平的时代，收入被赋予了目的价值。而当人们对收入的依赖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即达到临界收入之后，收入的价值必然由目的回归为手段，成为获取幸福的手段之一。此时，收入不再是幸福的同义词，因此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只关注收入的增长，是无法有效提升幸福感的。^③

① 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

② 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③ 陈湘舸、张修红：《论幸福悖论的成因与启示》，《经济经纬》2008年第3期。